

# 傅修延叙事学研究简论

## A Brief Discussion on Fu Xiuyan's Narrative Studies

赵炎秋 (Zhao Yanqiu)

**内容摘要:** 傅修延的叙事学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989 年至 2004 年，第二阶段从 2015 年至今。两个阶段傅修延共发表叙事学方面的论文近百篇，出版专著七部，主编七卷本套书一套。傅修延的叙事学研究主要围绕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和源起、听觉叙事和中西叙事比较三个方面展开，在三个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傅修延叙事学研究具有创新性、广谱性、中华性和人文性等四个特点。

**关键词:** 傅修延；叙事学研究；中国叙事传统；听觉叙事；中西叙事比较

**作者简介:** 赵炎秋，海南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本文系海南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重点资助项目“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研究”【项目批号：HSSKGY2501】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A Brief Discussion on Fu Xiuyan's Narrative Studies

**Abstract:** Fu Xiuyan's narrative studie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hases: the first phase from 1989 to 2004 and the second phase from 2015 to the present. During these two phases, Fu Xiuyan has published nearly a hundred papers on narrative studies, authored seven monographs, and edited a seven-volume set of books. His narrative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ree aspects: the formation and origin of Chinese narrative tradition, auditory narrative,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narratives. He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accomplishments in all three areas. Fu Xiuyan's narrative research is characterized by four features: innovation, broad spectrum, Chineseness, and humanism.

**Keywords:** Fu Xiuyan; narrative studies; Chinese narrative tradition; auditory narrative;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narratives

**Author:** Zhao Yanqiu,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at the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f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aikou 571158, China), specializes in literary theory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 zhyq814@163.com).

作为中国最早的叙事学研究者之一，傅修延教授从1990年在《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发表第一篇叙事学研究方面的论文“试论叙事作品中的人物标示”，1993年发表叙事学专著《讲故事的奥秘——文学叙述论》，到2024年出版其所主编的叙事学研究七卷本系列丛书《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至今已在叙事学研究的道路上跋涉了35年，并取得了重大成就。追溯其叙事学研究走过的路，探讨其叙事学研究成果、特点及其相关思想，对于总结中国叙事学研究的经验，启示青年叙事学研究学者，进行中外叙事理论的交流，应是不无裨益的。

### 一、傅修延叙事学研究的第一阶段

傅修延生于1951年，下过乡，当过工人，1977年考入江西师范学院（江西师大前身），就读于英语语言文学专业，1979年本科在读期间考入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外国文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sup>1</sup>，1982年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1995年，已是教授、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傅修延考入扬州大学攻读古代文学博士学位，1998年毕业。

傅修延硕士论文的题目是“济慈美学思想初探”，毕业留校工作后仍然继续济慈的研究。同时他又开辟了另一研究领域：文学批评方法。1988年出国访学前夕，他对自己的这一工作做了如下总结：“我已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工作，即对文学批评方法论的体系作了初步勾勒与探索。第二阶段的工作也即将完成，这就是将文学批评方法论的研究深入到思维学层次，试图建构一门文学批评思维学。我现在正在筹划第三阶段的工作，试图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与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作一些比较，这也就是非常有意义的‘比较诗学’研究”（“傅修延，我的风帆”），可见他这时已在文学批评方法领域登堂入室，然而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比较文学中心的访学改变了他学术研究的方向。

在多大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傅修延与加拿大学者诺思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有过交集并听过弗莱讲授的课程“《圣经》叙事”。但对他影响最大的则是研究中心的卢波米尔·多罗泽尔（Lubomír Doležel）教授。多罗泽尔教授“不但在讲课时经常提到‘Narratology’（叙事学）这个词，他还把引人入胜的‘可能的世界’理论介绍给我们，因此他的课堂上总是充满了对叙事中诸多可能的热烈讨论”（萧惠荣 4）。这次访学使傅修延从济慈、学术批评方法论的研究转到了叙事学研究。

傅修延的叙事学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0年到2004年，第二阶段从2015年至今。

1989年从多伦多大学访学归来之后，傅修延开始重点研究叙事学。论文“试

1 1978和1979两年为了“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国家允许在读大学生以及未读大学的其他青年才俊考研。

论叙事作品中的人物标示”的发表标志着他学术研究的转向。到2004年,他共发表叙事学方面的论文数十篇,出版叙事学方面的专著4部,分别是《讲故事的奥秘——文学叙述论》(1993)、《叙事:意义与策略》(1999)、《先秦叙事研究》(1999)、《文本学》(2004)。

《讲故事的奥秘——文学叙述论》共分十章。专著融合了西方叙事理论、中国的相关材料以及作者自己的理解与发挥,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知识系列。在国内叙事学研究还很薄弱的上世纪90年代初,作者似乎并不满足于仅仅介绍西方叙事理论,或者通过自己的缝补与联缀将西方叙事理论连接成一个知识的整体,形成一部著作。作者总是力图在西方叙事理论的基础之上融入自己思考与观点,让专著带上一定的中国色彩,显出一定的中国因素。比如专著的第二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叙事虚构的世界,它的边界、规模以及维度与密度;第二部分以真实的世界与不可能也即人类想象无法企及的世界为两极,以离真实世界的距离为标准,将位于这两极之间的叙事虚构世界由近到远地分为可能、神奇、荒诞和悖谬四个世界;第三部分讨论虚构世界与真实世界的关系,指出叙事为人类创造出另外一个世界,人类不止生活在一个世界之中。叙事虚构的世界要对真实的世界产生冲击,而真实世界则要对虚构世界进行规范。整章内容与西方叙事理论有一定的联系,但却不是西方叙事理论的简单移植,而是融合了作者自己的思考与理解,有自己新的东西。其他章节也是如此,只是有的章节作者自己的思考多些,有的章节少些。但不管多少,作者总是尽量根据自己的理解,结合中国的材料,提出自己的观点与思想,使整部专著的知识体系带上一定的自主因素,具有一定的中国色彩。<sup>1</sup>

《叙事:意义与策略》是一部论文集,收录了傅修延1992年至1998年间所发表的部分论文,共17篇,加上3篇写于80年代的论文,构成了全书连“引言”在内的20个单元。傅修延在“引言”中写道:“我喜欢从根本上思考与文学叙事有关的一些问题,它们常常使我神思飞越,不知此身之安在”(1)。从某种意义上说,“从根本上思考与文学叙事有关的问题”构成了本书的基调。这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说,这部论文集的内容不是对西方叙事学的阐释与介绍,而是对于相关叙事问题的探讨<sup>2</sup>;第二层意思是说,论文集中对中国问题的探讨占据了很大的篇幅,如“中国叙事学开篇:四部古典小说新论”、“《山海经》对后世叙事思维的影响”、“汉语与叙事”等等;第三层意思是说,论文集讨论的虽然是些具体的作品和文学现象,但作者的思考却往往指向更为普遍的问题。如上述三个单元的题目,再

1 自然,由于侧重自己的理解和自主知识的融入,这部专著在叙事理论的系统性方面相对90年代初的其他几本叙事学著作要弱一些。

2 当然,这并没有隐含对西方叙事学的阐释与介绍没有意义的意思,只是说这是《叙事:意义与策略》这本书的一个特点。

如以下单元：“关于近期叙事学研究之意义——兼评董乃斌近著《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讨论由董乃斌的著作引起，但目的却是讨论当时出版的以《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为代表的相关著作在叙事学研究方面的意义。“这些研究的一个共同之处是跳出了‘小说’研究的窠臼，开始从叙事角度作出更新一层的思考，其讨论对象涉及中国小说的叙事动机、叙事谋略和叙事模式等多个方面。虽然这些著作不是小说史，但在这些作家笔下，中国小说演进的脉络更加令人信服地呈现出来。之所以能有这种历史性的进步，关键在于抓住了小说的本质特征——叙事”（17）。其他单元大致也是如此。著作虽然是论文集的形式，但讨论的问题却有一定的系统性。

《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与《叙事：意义与策略》出版于同一年（1999）。这本书的写作，与傅修延的博士生涯有密切联系。傅修延攻读博士学位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拿张博士文凭，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感到自己越来越趋向本民族的文化，内心深处‘我是中国人’的声音越来越响亮”（《先秦叙事研究》321）。三年读博生涯，傅修延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一方面，承担的工作没有减少甚至有所增加（1996年，他由文学院院长升任江西师大副校长），另一方面，进入一个新的学术领域必然要求额外的付出。<sup>1</sup>但辛勤的劳作也给他带来了丰硕的成果。博士期间及后续的学习使他把握了一个新的领域：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同时也使他的叙事学研究更多地侧重中国本土。《先秦叙事研究》就是这一转向的明显标志。

《先秦叙事研究》有一个副标题：“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这说明这部著作的主旨不是系统地研究先秦叙事、更不是先秦文学叙事，而是通过对先秦叙事的探讨，寻求中国叙事传统形成的原因。专著将远古时期的结绳、图画和汉字的发明作为叙事的工具，将甲骨和青铜作为叙事的载体，认为口舌传事是远古时期叙事的主要方式。通过探讨，作者得出四点认识：“一、在先秦叙事中，叙事诸要素由朦胧走向清晰，对叙事行为的驾驭逐渐成熟，其中记言能力的迅速成长尤为突出。二、先秦叙事已经表现出相当清醒的自觉，作者的主体意识亦有所抬头，这些促进了对叙事形式的讲究，导致叙事中虚构成分增多，为历史性叙事与文学性叙事分道扬镳各领风骚作好了准备。三、先秦叙事在中华民族叙事思维上打下了根深蒂固的烙印，其形态、倾向与特征对后世叙事发生了深刻影响。四、先秦叙事处于中国叙事史上的拓荒阶段，它播下的许多种子为后世叙事提供了丰富的生长点，它建立的一系列范型亦获得绵延不绝的发扬光大”（5）。中国叙事传统发展到当代，其基本面貌的“家族特征”与作为中国叙事源头的先秦叙事是密切相关的。专著的创新性与学术价值都值得肯定。

《文本学——文本主义文论系统研究》出版于2004年。全书共分十一

1 傅修延本科读的英语专业，硕士读的比较文学专业，博士读的古代文学专业。古代文学对于读博前的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领域。

章。第一至第五章为第一部分，以文本学为主线讨论了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新叙事学等西方文论流派的文本观念。第六至第九章为第二部分，从汉语文本的独特性、中国古代辨体分类中的文本观，和中国古代小说、诗歌理论中的文本观念等四个方面，运用现代的概念和范畴，对汉民族的文本观念进行了归纳和阐发。第十和第十一章为第三部分，从中西融合的角度对文本学的一些基本观念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同时从文本学的角度讨论了当时正处于风头中的“超文本”问题。傅修延认为，“西方的文本学虽称发达，但从总体上说有观点偏激和视野褊狭两大弊病：观点偏激主要表现为忽视乃至蓄意割断文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视野褊狭则为对西方之外的文本学传统懵无所知”（3）。作者希望改变这种状况，通过引入中国古代的文本观念，使中西文本观念形成参照，并在参照的基础之上对二者进行整合，形成一种新的理论。但这种整合还有待更加深入与系统。同时，由于专著的重点在中西文本理论的研究、参照与整合，因此对于文本理论本身的系统研究也还有待加强。

## 二、傅修延叙事学研究的第二阶段

《文本学》出版之后，傅修延叙事学研究第一阶段结束，其学术研究的重心转到济慈和赣鄱文化上来。这种转向应该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2005年他由江西师大副校长转任江西社会科学院院长，工作岗位的变动导致其学术研究重心的转移。作为省社科院院长，他必须配合省委省政府工作重心，关注江西本土问题和江西建设；二是他从硕士开始的济慈研究需要有一个圆满的结尾；三是《文本学》出版之后，傅修延的叙事学研究遇到瓶颈，他需要沉下心来，寻找新的方向与突破。在叙事学研究的这段沉静时期，傅修延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济慈和赣鄱文化两个方面。在济慈研究方面，他出版了两部专著：《济慈评传》（2008）、《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2014）。<sup>1</sup>后者2013年曾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赣鄱文化方面，他三次主持并完成江西省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重大招标项目，其中“关于建议申报鄱阳湖生态经济试验区的研究报告”为江西省政府采纳，鄱阳湖生态经济区2009年经国务院批准上升为国家战略。此外，他还先后出版《赣文化论稿》（2004）、《生态江西读本》（2019）等著作，与卢普玲共同主编著作《江西文化》（2018）。由此可见，在叙事学研究的沉静时期，傅修延并没闲着，学术成果依旧丰硕。

以2015年《中国叙事学》的出版为标志，傅修延的叙事学研究进入第二阶段。自然，任何人的学术研究，其阶段划分都不是黑白分明的，每个阶段的研究都存在相互交叉的现象。所谓叙事学研究沉静时期只是相对于研究的活跃时期而言。正如傅修延的济慈研究和赣鄱文化研究并不局限于叙事学研

1 2002年，傅修延还出版了一部译著，《济慈书信集》，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年。



究的沉静时期，在沉静时期他也并非没有涉足叙事学的领域。就学术成果而言，从2005年到2014年，他仍然发表了十多篇叙事学研究方面的论文，特别是2010年发表于《江西社会科学》第4期上的“元叙事与太阳神话”，这篇论文曾获教育部“第六届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在学术活动方面，他也做了不少工作。如2004年，参与筹办在漳州师范学院（现闽南师范大学）举行的“全国首届叙事学学术研讨会”，2010年在江西师范大学成立“江西师范大学叙事学研究中心”等。这些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为他的叙事学研究在2015年进入第二阶段做好了准备。

在第二阶段，傅修延在叙事学方面共发表论文四十多篇<sup>1</sup>，出版专著《中国叙事学》《听觉叙事研究》《趣味叙事学》三部，主编多卷本丛书“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一套。

《中国叙事学》出版于2015年，曾获教育部“第八届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24年入选“优秀学术著作再版项目”。2022年，澳大利亚学者保罗·道森（Paul Dawson）主编的叙事学权威参考书《劳特利奇叙事理论指南》（*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 2022）第十八章重点评述了傅修延在叙事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其中特别推介《中国叙事学》，说明这部专著已经得到国际叙事学界的认可。

傅修延指出：“《先秦叙事研究》对先秦时代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脉络、基本轮廓与主要特点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中国叙事学》则进一步突破文学范围，向人类学、宗教学、神话学、语言学、符号学、民俗学以及地域文化等领域广泛征求工具与材料，对诸多叙事文本、‘含事’器物与‘涉事’感知等进行知识考古学般的刨根问底。这种谱系学意义上的调查，旨在为中国叙事传统的源起与形成提供更为合理的系统解释”（唐伟胜5）。两部专著具有前后相续的关系，其目的都在探讨、阐释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和起源。这也是傅修延的《中国叙事学》与力图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上建构中国自己的文学叙事体系的杨义的《中国叙事学》的不同之处。傅修延认为，“中国的叙事学或叙事研究不等于中国叙事学”（《中国叙事学》14）。“所谓‘中国叙事学’，我们理解就是以‘中国叙事’为研究对象的学问”（《中国叙事学》16）。中国的叙事学研究成果丰富，但大多数研究还是在西方叙事研究的轨道上运行，运用的主要还是西方的材料，这不利于打破叙事学研究的西方中心，也不利于叙事学的普适性发展。中国学者在叙事学研究中应该更加关注中国文化和中国的叙事实践，在中西融合的基础上探索普遍的叙事规律。“中国叙事学”自然可以成为学科，但建构叙事学的“中国学科”并不是当务之急，当务之急是将“中国叙事”作为中国叙事学者的研究对象。这两个方面的原因：

1 这些论文中不少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叙事与听觉空间的生产”“物感与‘万物自生听’”“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叙事——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与变革”“为什么麦克卢汉说中国人是‘听觉人’——中国文化的听觉传统对叙事的影响”“论音景”等。

一是从国际叙事学界的总体趋势看，后经典叙事学兴起之后，叙事学逐渐与叙事研究同义，学科意味正在淡化；二是学科性质的“中国叙事学”应该在大量“中国叙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才能成功建构。

本着这一认识，傅修延认为，“从方法论角度说，当前的中国叙事学研究似应从以下五方面探寻创新之途”（《中国叙事学》29）。这五个方面一是调查范围的扩大，将研究扩大到“文学艺术叙述”之外，比如青铜器、陶瓷上的叙事；二是考察时段的提前，对叙事不仅要进行“长时段”的考察，更要考察叙事的起源阶段；三是研究范式的转换，突破学科限制，将叙事学与其他学科理论结合起来，针对不同问题设计不同解决方案；四是既有观念的“裂变”，要对一些通行的叙事观念进行反思、变化，如将静态描写纳入到叙事研究的范围；五是“地方性知识”的介入，就国际范围来说，“地方性知识”的“地方”指的是中国，而就中国范围而言，“地方性知识”的“地方”指的则是省、市甚至县，总之，就是要考虑不同国度、民族、地域的叙事实践、叙事传统，特别是那些有特色的叙事作品、叙事材料。《中国叙事学》的内容就是按照这五个方面组织、展开的，在研究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颇具启发性。

《听觉叙事研究》出版于2021年，是傅修延所有叙事学著作中最重要的一本。曾获2023年教育部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江西省第二十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22年列入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推荐书目，2023年英译本获准立项。有学者认为，“叙事学的‘中国创造’主要有三：双重叙事进程、广义叙述学和听觉叙事”（江守义161）。这里的听觉叙事指的主要就是《听觉叙事研究》。

傅修延开始关注听觉叙事，应该是他在扬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他的博士论文做的是中国叙事传统，在看材料的时候他发现中国“古人的听觉感知特别灵敏、精巧和细腻”，“于是我在论文中单列了‘声音与音乐’一章”，“后来接触到麦克卢汉的‘中国人是听觉人’之论，我感到这一石破天惊的论断与自己的认识存在一定程度的契合。”经过认真的比较研究，他觉得与“视觉优先”在西方出现较早相反，古代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保持着听觉社会的诸多特征。从感官倚重这一角度，可以解释中西叙事传统的根本不同。<sup>1</sup>这是他研究听觉叙事的缘起和动机。傅修延听觉叙事的最早成果应该是出版于1999年的《先秦叙事研究》第四章“声音与音乐：口舌传事的流行”，集中精力研究听觉叙事是从2013年在《江西社会科学》第2期发表论文“听觉叙事初探”开始的，以后成果不断，直到2021年出版专著《听觉叙事研究》。

《听觉叙事研究》具有很强的创新性。这种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是转换了叙事学的关注重点，将听觉研究提到叙事研究的日程。傅修延认为：“现行的文学理论需要反思自己的不足，虚构世界里不光有形还有声（以

1 参见傅修延：《听觉叙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423-424页。

及气味等），而目前通用的文论术语，如‘视角’、‘观察’和‘聚焦’之类，几乎都只与视觉相关，好像视觉信号的传递可以代替一切，很少有人想到我们同时也在用耳朵和其他感官接受信息。眼睛在五官接受中的中心地位，导致研究者的表达方式出现向视觉的严重偏斜。前些年有人指出国内文论在外界压迫下的‘失语’表现，其实‘失聪’更是中西文论的一大通弊”（《中国叙事学》12）。而《听觉叙事研究》就是对这种“失聪”现象的反拨与弥补。听觉叙事“指的是叙事作品中与听觉感知相关的表达与书写”（傅修延，《听觉叙事研究》1）。从源头看，人类早期叙事无疑都是口头叙事，其中听觉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西方叙事理论关注的始终是叙事文本，很少将目光投向听觉，很少关注听觉叙事在叙事中的作用。<sup>1</sup>这不仅遮蔽了听觉在叙事中的作用，也影响了我们对叙事的立体理解，形成对叙事理解的视觉片面性。傅修延提出“我听故我在”“我被听故我在”，提倡“重听经典”，将听觉叙事提到叙事研究的前台，这实际上是对叙事研究中“视听失衡”现象的一种纠偏，很有意义和价值。其二，是与听觉叙事相关的概念和术语的创造。任何一个学科或成体系的学术观点都需要有自己特定的概念与术语，这是学术体系得以成立的基础之一，也是学术创造性的标志之一。在《听觉叙事研究》中，傅修延创造了系列的具有独创性、内涵明确的概念和术语，如和“观察”相对的“聆察”、和“图景”相对的“音景”、与“形象”相对的“声象”，以及音标、幻听、灵听、偶听和偷听，等等。这些概念与术语不仅有很高的独创性，而且很好支撑起了“听觉叙事”这一新的学术体系。<sup>2</sup>其三，是研究范式的转换。傅修延自己认为，《听觉叙事研究》的贡献，“大而言之，是为听觉叙事研究做了一番鼓与呼，小而言之，是从中西叙事作品中拈出了许多过去不大为人重视的听觉事件”（《听觉叙事研究》421）。这一总结有谦虚的成分，《听觉叙事研究》的贡献不止于此。但这一总结也指出了“听觉叙事”实际提出了一种新的叙事研究范式。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讨论。一是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的基本研究范式是在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指引下，通过对某种叙事规律的总结和运用，来探讨叙事作品的意义。而听觉叙事由于“语音独一性”和听觉模糊性，更加注重“听”的具体情况，这样，形而上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便让位给了形而下的感性侧重。二是由于范式的转变，听觉叙事与视觉叙事在研究侧重点上也就形成了鲜明的特点。视觉叙事侧重叙事内容和客观分析，而听觉叙事则更侧重“听者”的感知和判断。同一听觉内容，不同感知者的感知有所区别，得出的结论也不一定一致。这就形成了

1 自然，西方叙事学者也不是完全没有涉及听觉和听觉叙事，比如亨利·列菲伏尔强调要恢复包括听觉在内的视觉之外的感觉，罗兰·巴特认为口头的“有声语言”也应是叙事关注的对象，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丘园》《达洛威夫人》等书中对听觉空间进行了开拓性的叙述，卡迪-基恩的论文“现代主义音景与智性的聆听：听觉感知的叙事研究”（2005）研究了伍尔夫小说中的听觉叙事，等等。但这些关注与研究还比较零散，无法形成系统的研究领域和研究传统。

2 参见江守义：“叙事理论的中国经验及其思考”，《学术月刊》10（2024）：164。



听觉叙事研究的开放性和灵活性。其四，是《听觉叙事研究》的中国性。与国内大多数叙事理论著作不同，傅修延的《听觉叙事研究》是建立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之上，在中华文化语境中建构自己的观念体系的。专著抓住了中国人“重听”的叙事传统，在材料的选择与使用上，也尽量侧重中国的叙事作品和叙事现象，使相关的观点和结论尽量在中国材料的基础上做出，符合中国叙事传统的实际。相对于国内外叙事研究传统，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创新。自然，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性本身也是一种价值。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听觉叙事研究》达到了创新性与中华性的结合，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趣味叙事学》出版于2022年。叙事学是一门有价值、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学科，但其理论与方法有些又过于复杂、抽象与精深，一般读者难以把握，容易产生畏难情绪。有必要先以趣味将其吸引到叙事学的门口，读者产生兴趣之后自然就会登堂入室。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傅修延设计了101个问答，分别归入缘起、故事、叙事传统、讲述、策略、感知、可能的世界、人与物等八个方面，每个问答先以提问引出问题，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解答，在解答的基础再进行点评，引出相关的叙事理论与观点。比如本书的第一问“灵长类动物为什么经常互相梳毛？”作者解答说灵长类动物相互梳毛是一种社交行为，目的是形成团体、维护友谊。这有点类似团体中的八卦（嚼舌头），八卦也是一种团体行为，作用是维护群体团结，形成“统一战线”。八卦形成故事，故事则是一种叙事行为。这一问最后点评：“梳毛是八卦的前身，八卦是叙事的起源，这一切都和人类抱团取暖的进化策略有关”（3），说明叙事起源于人类“抱团取暖”的行为。人类先祖生活在物资产生力十分低下的时代，低下的生产力决定了人们必须形成集体才能生存。叙事既是在人类集体形成过程中产生的，同时也帮助稳固、维持、发展着人类的集体。一个重要的观点就这样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被读者所接受。

傅修延叙事学研究第二阶段的另一重要成果是主编了多卷本套书“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套书是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的最终成果，共分七卷，分别是：《关键词卷》《叙事思想卷》《神话卷》《小说卷》《戏剧卷》《诗歌卷》和《民间卷》。七本著作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共同完成中西叙事传统比较这一任务。套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现已出齐。傅修延认为，叙事传统有维系文明之功。中国叙事传统和西方叙事传统是世界两大叙事文明，各有特点，也各有自己的长处与不足。但如果各自囿于自身的叙事传统，难免目光受限，会有“不识庐山真面貌”之虞。因此，有必要将中西叙事传统互为参照，从长时段、广视野的角度进行比较研究，以更加清楚地认识自身和对方。中国叙事学可以借此取长补短，推进中国叙事和叙事理论的发展。套书内容丰富，创新性强，可以说是中国叙事学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也是傅修延对中国叙事学研究的又一贡献。

### 三、傅修延叙事学研究的特点

通过一、二两节的分析与论述,傅修延叙事学研究的特点已经初步显现,如果加以总结,可以归纳为四点:创新性、广谱性、中华性、人文性。以下分别阐述。

#### (一) 创新性

创新是学术研究的生命。傅修延十分重视创新,他曾与同事推心置腹地谈,“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创新能带来世界上最令人陶醉的幸福感”(邱宗珍 13)。傅修延叙事学研究的创新性可以从三个方面讨论。

其一,傅修延的叙事学研究具有很强的方向性与目的性。这种方向性与目的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要纠正西方叙事学研究的偏颇,使叙事学研究更具普适性;二是要研究叙事学的源头,探讨中国叙事传统的源起与形成;三是要进行中西叙事与叙事理论的比较研究,以“另一种眼光”来研究中国叙事,促进中国叙事理论的全面发展。傅修延的叙事学研究整体上就是围绕这三个方面展开的。

其二,傅修延的叙事学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思路。傅修延认为,西方叙事学总体上看走在中国叙事学的前面,但西方叙事学有两个重要的不足,一是深藏于“语言学钦羡”之下的“物理学钦羡”,二是其理论视野褊狭。西方叙事学主要源于对西方叙事规律的归纳和总结,对于中国经验关注不够,这样他们的理论就很难做到普适性。“所以中国学者在探索普遍的叙事规律时,不能像西方学者那样只盯着西方的叙事作品,而应同时兼顾或者说更着重于自己身边的本土资源”(唐伟胜 6)。在融会中西的基础上建构更具“世界文学”意味的叙事学科。自然,中国叙事资源是丰富而广阔的,作为具体的学者不可能面面俱到。傅修延将自己的研究集中在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听觉叙事、中西叙事比较三个方面,研究理路十分清晰也很有价值。

其三,通过深入的研究,傅修延在自己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形成了自己的观念体系,提出了经过自己思考站得住脚的结论。比如关于听觉叙事。首先,傅修延提出,从感官倚重的角度可以深入地阐释中西叙事传统的根本特点。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信息”,不同的媒介或感知途径对于信息接受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怎样感知决定着感知什么。西方文化具有“视觉优先”的特点,而古代中国则在很长时间内一直保持着听觉社会的诸多特征。这是中西叙事叙事差异的根本原因之一。其次,傅修延从不同角度探讨听觉叙事的基本现象、重要规律和叙事策略。认为要全面地理解与把握叙事活动中的“失聪”问题,就要重视听觉,恢复听觉在叙事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一种高度倚重视觉的文化必定会对事件的组织形式作精细的审查,而与听觉保持密切关系的文化则更关心事件稍纵即逝的运行。在听觉模糊性与视觉明朗性背景之下形成的

两种冲动，不仅影响了中西文化各自的语言表述，而且渗透到对结构的认识之中”（林瑛6-7）。听觉可以弥补视觉的不足，使我们更加全面地把握叙事。再次，傅修延构建了听觉叙事的话语体系，如音景、聆察、音象等等。话语体系是学术体系的思想表征，同时又支撑着学术体系。独特完整的话语体系某种意义上也说明了学术体系的独特与完整，是创新性的另一种表现。

## （二）广谱性

广谱性指傅修延叙事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的广度。与西方经典叙事学将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固定在文学文本上不同，傅修延的叙事学研究虽然也涉及到大量的文学文本，但却远远超出了文学文本的范围。在傅修延的叙事学研究中，所有与叙事有关的对象都可成为研究的内容。如诸子之文、史传之文、口舌传事、甲骨青铜陶瓷上的相关记载和叙事、神话、传说甚至人的外貌都可以进入他的叙事学研究范围，而且在每一个研究对象那里，他都能挖掘出深厚的叙事内涵，提出有启发性的观点。如后收入专著《中国叙事学》的“元叙事与太阳神话”这篇论文。论文使用的“元叙事”这一概念与译自英文“*metanarrative*”的“元叙事”含义不同，它不是“关于叙事的叙事”或“总体性叙事”“形而上叙事”的意思，而是“本原叙事”“首度叙事”的意思。论文认为，元叙事可定义为关于太阳运行的最初叙事，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太阳神话。元叙事对人类认知发育影响深远：太阳在先民视觉上的从东到西以及在夜间想象中的从西到东，为叙事提供了深层结构与基本冲突，这种周而复始的运动所导致的循环论，启发了“以圆为贵”的叙事思维。建构中国叙事学自己的思路与体系，应该从元叙事及其相关的太阳神话吸取相关的营养与思想。论文的观点不仅完整，而且很有创新性。

与经典叙事学不同，西方后经典叙事学扩大了叙事研究的范围，将研究范围延伸至文化意义上的叙事作品，和经典作品之外的其他作品，同时将叙事学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形成新的叙事研究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相对经典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也是一种广谱叙事学。但傅修延叙事学研究的有些领域是后经典叙事学也没有涉及的，如对叙事载体如甲骨、青铜、陶瓷等的研究，说明不同载体上的叙事在中国叙事传统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再如对人体组成部分如面容的研究，说明面容作为能指的叙事功能及其历史发展。媒介即信息，面容的性质决定了通过面容感知到的东西的性质，面容叙事在读图时代具有的重要性，等等。

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傅修延对听觉叙事的研究。赵毅衡认为，傅修延的听觉叙事“在文字、语言、视觉之外，为世界叙事学运动开辟了一个全新的亚体裁研究畛域”（转引自 邱宗珍 14）。傅修延的听觉叙事研究弥补了世界叙事学研究中的“失聪”问题，为叙事学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傅修延的听觉叙事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较少，他主要依靠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与叙事资源，结合现代叙事理论，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提升。在研究听觉叙事

的同时,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叙事倚重听觉这一重要特点,使传统文化与传统叙事在叙事理论的现代进程发挥出新作用。从这个意义说,也是传统文化推陈出新的一个范例。由此可见傅修延叙事学研究的广谱性不仅仅是研究的范围广,也是开拓了叙事学界尚未关注到的研究领域。

自然,傅修延的叙事学研究是学者个人的研究,而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是叙事学的两大流派,把二者拉在一起进行比较似乎有点不伦不类。笔者以为,二者之间的确是有点不对等,不过笔者的本意也不是要对二者做对等的比较研究,只是希望借助对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的描述,说明傅修延叙事研究的对象与范围突破了经典叙事与后经典叙事学的畛域,有中国学者自己的特点。

### (三) 中华性

中华性指一种理论所具有的中国特性。中华性可以从中国身份、中国立场、中国现实、中华文化、中国材料、中国发现等几个方面探讨。傅修延是中国学者,中国血统,出生中国,在中国接受的教育,中国身份天然具备,这里主要就其他几个方面进行说明。

先谈中国立场。中国立场要求学者的研究立足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秉持中国精神,维护中国利益。傅修延认为:“读书人不能一味独善其身,有机会报效桑梓时应有所作为。我始终相信文化人存在的意义就是延续自身所属的文化”(林瑛 11)。这种报效祖国、报效民族、报效故乡的责任感使傅修延在进入叙事学研究领域时坚定了自己的中国立场。他对西方叙事学研究的不足的批评,对中国叙事源头的探寻,对听觉叙事的研究,无一不是一个中国学者在叙事学研究中的中国身份与中国立场的体现。

再谈中国现实。现实是任何理论形成、发展的基础。中国的叙事理论应该建立在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叙事文学的现实之上。傅修延叙事学的研究对象虽然主要是中国古代文化和古代叙事理论与叙事实践,但充满了现实精神,顺应了中国腾飞的现实。傅修延“一贯主张学问要和事功结合”,认为“象牙塔内没有真正的生活”,“做学问需要接地气,躲在书斋中读几本书成不了气候”(唐伟胜 9)。学问必须立足中国现实。他曾坦言,他之所以将自己的研究“转换到听觉研究这种范式,为的是从感官倚重角度深入阐释中西叙事传统的根本特点”(林瑛 5)。是建构中国自己的叙事理论的需要。由此可见,傅修延的叙事学研究归根结底是由中国的现实决定的。

三谈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既是傅修延叙事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其主要背景和基本依托。他最重要的三部叙事学研究专著《先秦叙事研究》《中国叙事学》《听觉叙事研究》研究的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现象。如《先秦叙事研究》对于甲骨与青铜等叙事记载工具的研究,对史传运事的中国特有叙事现象的研究,都是中华文化的特别现象和重要遗产。他的叙事学研究处处都有中华文化的背景。即使是他最早的以西方经典叙事学为蓝本撰写的《讲



故事的奥秘》，如果和同时期的其他一些国内叙事原理著作相比，也可明显看作其中深厚的中国因素，专著的材料、例证以及论述思路等，都有意识地向中华文化与中国叙事倾斜。

四谈中国材料。所谓中国材料，就是在研究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参考、借鉴、引用中华文化、中国叙事方面史实、作品和记载。傅修延虽然英语专业出身，但中文功底深厚。据他自己讲述，他在读中学的时候，就利用替他父亲整理其管理的资料室的机会，阅读了资料室里的很多中文典籍。<sup>1</sup>1995年44岁时，仍以教授身份考入扬州大学攻读古代文学博士学位，1998年毕业。他的叙事学著述里中国材料比比皆是，其实是顺理成章的事。

五谈中国发现。中国发现包括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建构新的知识体系等。中国发现是中华性六个方面中最重要的一个。傅修延叙事学研究的中国发现可以从三个方面探讨。一是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如他的听觉叙事研究。二是提出了新的理论观点。傅修延叙事学研究中新的理论观点有的是他自己的独创，如他关于元叙事与太阳神话的探讨。有的是他在他人观点的基础上的发挥与开拓。如他的论文“为什么麦克卢汉说中国人是‘听觉人’——中国文化的听觉传统及其对叙事的影响”。<sup>2</sup>中国人是“听觉人”这一观点是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提出的，但傅修延将这一简短的论断转换到中国文化的听觉传统并引申出听觉叙事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则不能不说是他自己的创新。三是创造了新的知识。如对中国叙事传统的溯源，从听觉叙事的角度对一些以前不被人重视的听觉事件的分析等。

#### （四）人文性

人文性指从人出发、对人关怀、为人服务。傅修延认为，“叙事学归根结底是一门与文学、美学有密切关联度的人文学科，因为它的对象是人际间的讲故事行为，因此这门学科不可能像物理学研究无生命的对象那样完全客观、机械与漠然。我之所以反对把讲故事活动当作解剖桌上‘冰冷的尸体’，依据就是这种活动有美感有温度，故事中有人的生命体验”（唐伟胜 3）。叙事学研究的是有温度、有生命的对象，自然不能像研究无生命对象的学科如物理学那样客观、机械与冷漠。自然，这并不是说物理学没有人文性，但物理学的人文性或者说人文关怀主要是通过它的研究成果造福人类推动社会发展体现出来的，而叙事学则要在其研究活动和成果本身体现出人文性。在傅修延的叙事学研究中，这种人文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研究者个体来说，研究者对于自己从事的研究、对于研究对象应当感兴趣，充满热情，喜欢自己从事的研究，只有这样，研究者才会对研究对象充满热情，并把这种热情贯穿到整个研究过程。二是从研究结果来说，人文性则体现在研究内容与研究

1 傅修延的父亲徐先兆先生（傅修延母亲傅双文，他随母姓）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南昌八一起义的重要人物之一。1957年被划为右派，曾被安排在江西师范学院资料室工作。

2 这篇文章发表于《文学评论》2016年第1期，曾入选《〈文学评论〉六十年纪念文选》。

结论要对人、对人类社会有益，对叙事文化、叙事理论与实践有推进作用。三是对理论接受者来说，理论对读者要友善。叙事理论以概念、判断、推理的形式进行观念的运作，不同于叙事文学直接描写人物与事件，在人文关怀方面不可能那样直接。这就要求叙事理论要深入浅出，尽量用读者容易理解的表述讲清深奥的道理。同时，要尽量“用鲜活的材料来说明问题，而不是从头到尾都使用抽象空洞的论证”（唐伟胜 4）。从叙事理论读者的角度看，叙事研究者要尽量为读者着想。自然，深入浅出地讲述叙事理论，让读者容易理解，这本身就是为读者着想。但光有这一点还不够，叙事学研究者在向读者传授叙事学方面的理论和知识外，还应想法唤起读者对于叙事学的热情，使他们喜欢叙事学，阅读叙事学，研究叙事学。傅修延的《趣味叙事学》努力做到的正是这一点。这也应该是一种人文关怀。

阅读傅修延叙事学著述，我们可以感到，他不仅在努力从上述三个方面增进自己叙事学研究的人文性，而且在这三个方面都做得很好，从而形成了他的叙事学研究的第四个特点。

当然，任何学者的研究都有其不足。笔者以为，傅修延叙事学研究最大的不足是理论的系统完善性还有待提高。这大概与他的叙事学专著的内容大都以论文的形式发表过，在整合成书的时候有机融合还有所不够有关。相信在以后的研究中，他会弥补这一遗憾。

## Works Cited

- 傅修延：《趣味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 年。  
 [Fu Xiuyan. *Entertaining Narratology*. Beijing: Peking UP, 2021.]
- ：《听觉叙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年。  
 [— *A Study of Auditory Narratology*. Beijing: Peking UP, 2021.]
- ：《文本学——文本主义文论系统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  
 [— *Textology: A Systematic Study of Textualism Literary Theory*. Beijing: Peking UP, 2004.]
- ：“我的风帆——对生活与事业的爱”，《江西日报》，1988 年 3 月 27 日，第 4 版。  
 [— “My Sail—Love for Life and Career.” *Jiangxi Daily*. 27 March 1988: 4.]
- ：《先秦叙事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 年。  
 [— *Textology: Research on Pre-Qin Narratives: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Narrative Tradition*. Beijing: Oriental Publishing House, 1999.]
- ：《叙事：意义与策略》。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 年。  
 [— *Narrative: Meaning and Strategy*. Nanchang: Jiangxi Colleges and UP, 1999.]
- ：《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  
 [— *Chinese Narratology*. Beijing: Peking UP, 2015.]
- 江守义：“叙事理论的中国经验及其思考”，《学术月刊》10（2024）：157-169。  
 [Jiang Shouyi. “The Chinese Experience of Narrative Theory and Its Deliberation.” *Academic Monthly*

10 (2024) : 157-169.]

林瑛：“文学研究的中西比较自觉意识与文化自信——傅修延教授访谈录”，《英美文学研究论丛》1（2019）：3-12。

[Lin Ying. “Comparative Awareness of Western and Eastern Approaches to Literary Studies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Fu Xiyan.” *Journal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1 (2019): 3-12.]

邱宗珍、傅修延：“叙事学是一门有趣的学问——傅修延教授访谈录”，《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2022）：5-16。

[Qiu Zongzhen and Fu Xiuyan. “Narratology is an Interesting Subject: Interviewing Professor Fu Xiuyan.” *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2 (2022): 5-16.]

唐伟胜、傅修延：“叙事学与中国叙事传统——傅修延教授学术思想访谈”，《英语研究》2（2020）：1-12。

[Tang Weisheng and Fu Xiuyan. “On Narratology and Chinese Narrative Tradition: An Interview with Prof. Fu Xiuyan.” *English Studies* 2 (2020): 1-12.]

萧惠荣：“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叙事，一地方有一地方之文化——傅修延教授学术访谈”，《创作评谭》3（2019）：4-10。

[Xiao Huirong. “One era has its own narrative, and one place has its own culture—Academic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Fu Xiyan.” *Creative Criticism* 3 (2019): 4-10.]